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关键词

筑牢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历史记忆”

□ 苗宜澍

历史记忆是人类文明、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通过批判性继承实现对历史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使人类实践在精神领域得以对象化呈现。历史记忆的作用是多维的，不仅是民族根基的守护者，也是文明传承的载体，更是开创未来的启示录。于中华民族而言，历史记忆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历史记忆问题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这些重要论述，是理解中华民族精神密码的重要一环，是确保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把握历史主动、胸怀“两个大局”、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遵循。

2016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这条横亘千年的丝绸之路，超越了单纯的商道范畴，成为镌刻在沿线国家民族基因中的集体文化符号与共同精神遗产。“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这一珍贵历史记忆的时代性激活与创造性转化。它绝非简单复制古丝绸之路的路线图，而是深刻汲取了丝绸之路精神的精髓，并在21世纪世界普遍交往与全球合作的新背景下予以发扬光大。“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正是将古老丝路上穿越戈壁的商旅驼铃和远渡重洋的宝船帆影，升级为以现代基础设施、规则体系和人文交流为支撑的鲜活故事，构成了沿线人民对开放、包容、合作最原初的历史记忆。这份源于共同经历的记忆，成为今天消弭隔阂、增进互信、凝聚共识的宝贵财富，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其呐喊与理想早已熔铸为民族集体记忆的基因片段，凝结为根植于文化血脉中的价值认同。那些具象的史料与抽象的精神，共同构成民族自我认知的记忆和代际传递的身份密码。对五四精神的深入研究，本质上是对历史记忆的解码和重构。百年前的青年以思想启蒙打破封建桎梏，百年后的青年正以创新实践破解历史难题。这种基于历史记忆的精神传承绝非怀旧式的回望，而是指向未来的精神基石。发扬五四精神，就是将历史记忆转化为行动自觉，让百年前“外争国权”的呐喊，化作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让“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追求，融入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的鲜活实践。

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让正确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历史教育对塑造价值观和民族认同具有关键作用。党史学习不仅仅是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艰辛历程和伟大成就，更是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学习党史重在传承党的革命精神，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屈的奋斗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学习党史要做到学史明理，从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历经苦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史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的道理、学理和哲理。党史学习教育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共识与力量。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安阳市考察时强调，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红旗渠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艰难困苦时的坚韧不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也在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红旗渠精神所体现的团结协作与无私奉献的价值观，成为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桥梁，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历史记忆并非尘封的档案，而是面向未来的智慧，从红船精神的开天辟地到脱贫攻坚的勠力同心，从自力更生的奋斗底色到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无不承载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密码。筑牢与弘扬历史记忆，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铭记，更是对历史精神的延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的无形力量。

2024年4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既要保留历史记忆和特色风貌，又要解决居民关切的实际问题。城市的历史记忆承载着一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是市民共同的精神家园。城市更新过程中，老旧小区作为城市发展历程的见证，其物理空间、建筑形态、社区格局乃至生活痕迹，都是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既诉说着城市变迁的历史故事，也构成市民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与历史记忆紧密相连的是城市的特色风

貌，是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视觉与空间特征，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其文化吸引力和魅力的直观体现。在城市改造中，保留历史记忆与特色风貌就是确保城市文脉的延续，使后代能记得城市的过往，避免历史断层。保留历史记忆并非原封不动的固守，而是在尊重历史前提下的动态传承。这就需要在深刻理解城市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理念和技术手段，解决设施陈旧、功能缺失等现实问题，在提升居住舒适度和安全性的基础上，赋予老社区以新活力，使其历史记忆焕发时代生机。

2025年5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中强调，80年前，我们经过奋起反抗，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8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发展振兴的同行者、国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携手为人类前途命运争取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历经14年艰苦卓绝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的历史记忆，不仅重构了民族心理结构，将鸦片战争之后“屡战屡败”的创伤性意识转化为“敢于胜利”的民族自信，激活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集体意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抗战记忆绝非静态遗产，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的鲜活教材，唤醒人民对斗争历史的主体认同。重温这一历史记忆，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历史作用，还有助于重估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贡献。对这一历史记忆的代际传承，激励着中华儿女勿忘国耻、自立自强、凝心聚力、踔厉奋发，不断推动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

用六面“镜子”照出政绩观的“样子”

□ 谢兵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政绩观就是“观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员干部要正确处理“六大关系”，自觉用六面“镜子”来观照政绩，真正把正确的政绩观作为从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

用“透视镜”观视“为公”与“为私”。“为公”与“为私”反映政绩观的价值原点。政绩观首先要解决“政绩为谁而树”，是“为公”还是“为私”，这是政绩观的灵魂拷问。“透视镜”能洞察本质，用“透视镜”可以透视党员干部的初心与党性。“为公”与“为私”的界限，是政绩观正确与否的分水岭。党员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用“透视镜”照照灵魂深处，看看是否真正站稳了人民立场，是否有私心作怪、野心作祟。人民是阅卷人，党员干部是一心“为个人升迁镀金”还是真心为“百姓谋福祉”，群众心中有杆秤。真正的政绩不一定在光鲜的报表数字和总结里，而一定在群众的笑容和口碑中。

用“望远镜”观望“显绩”与“潜绩”。“显绩”与“潜绩”反映政绩观的“时间维度”。显功看得见、摸得着，潜功不显山、不露水但关涉长远。正确的政绩观应是“显绩”与“潜绩”、“物质”与“精神”并重，既重当下，更谋长远。“望远镜”能看清远处，用“望远镜”能看出党员干部的胸怀与视野。现实生活中，受干部任期周期

与政策见效周期影响，政绩观上往往容易产生重“显绩”轻“潜绩”，甚至出现“作秀”代替“作为”现象，这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党员干部要既种“速生杨”，重视“见效快、看得见”的“面子工程”，又栽“红松树”，更重视“打基础、利长远”的“里子工程”；既要“富口袋”，重视构建物质上的“高楼大厦”，又要“富脑袋”，更重视构建精神上的“高楼大厦”，实现“物阜民丰”与“凝心铸魂”的有机统一，“仓廪实”与“知礼节”的协同并进。党员干部要像接力赛一样，既跑好自己的“显绩”一棒，更要为下一棒打下坚实的“潜绩”基础。

用“内窥镜”观察“成绩”与“成本”。“成绩”与“成本”反映政绩观的效益思维。政绩不能只看表面成绩，要算好“综合账”，避免“亏本买卖”。政绩考核既要计算显性收益，又要考虑隐性成本，只有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效益，让发展可持续，才是真正的“好政绩”。“内窥镜”能观察政绩的“健康度”，用“内窥镜”能照出党员干部的能力与能效。党员干部要树立“效益思维”与“成本意识”，既要讲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又要讲经济效益、历史效益，决策时要从经济、社会、生态、风险等方面进行充分的多维度成本效益分析，追求性价比高、可持续、综合效益最大化的政绩。要会算“综合账、长远账”，政绩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需要权衡的“综合算式”，只有算清经济账、生态账、民生账，将资

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债务风险等纳入考核，才能避免“寅吃卯粮”的短视行为，避免“血本无归”的惨痛教训。

用“分光镜”观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集体”反映政绩观的“角色定位”。政绩不是“个人独舞”，而是“集体交响”，政绩观既要体现个人贡献和功劳，更要彰显集体智慧和力量。“分光镜”具有分解功能，用“分光镜”能分辨党员干部的作用与作为。“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干事创业，党员干部必须走在前、干在先，带头干、一起干。政绩不是“个人秀”，而是“团队战”。党员干部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不贪功、不推责，不把政绩簿写成“个人传记”，不把集体成果算成“个人功劳”，评价政绩时，坚持个人与集体统一，客观反映个人努力与集体贡献。

用“多棱镜”观清“有为”与“无为”。“有为”与“无为”反映政绩观的边界理念。党委、政府和干部不是“万能型”，政绩不是“万事干”，政绩观也不是“万事管”。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核心是判断“该不该干、能不能干、怎么干好”。“多棱镜”能折射决策作为的焦点，用“多棱镜”折射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党员干部要多角度看问题，多维度作判断。政绩不是“刷存在感”，而是“精准发力”。坚持“有为”与“无为”相统一。积极作为，聚焦主责主业，做到该干的事

一定要干、尽到责任，在干的事就要干好、尽到能力；有所不为，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社会自治能力，不越边界，不盲目跟风，不搞“拍脑袋”决策，不代替经营主体决策，不包办社会事务。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要考量主观和客观的匹配度，既看党员干部个人主观努力，又看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历史欠账、政策环境等客观条件。

用“显微镜”观看“干事”与“干净”。“干事”与“干净”反映政绩观的双重标尺。党员干部既要干事，又要不出事。干事和干净并不矛盾，两者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显微镜”能看清“微生物”，用“显微镜”能观照出党员干部的本色和本分。党员干部既要干事更要干净，干事是本分、干净是本色。从一定意义上说，干净，是对党员干部老实做人的要求，考量重点是“德”和“廉”，反映党员干部政治本色；干事，是对党员干部扎实做事的要求，考量重点是“能”“勤”“绩”，反映党员干部使命担当。党员干部惟有坚持干净打底、干事当头，把干净和干事有机融合、一体推进，方能行稳致远、创造成绩。

大有 笔潭

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表明，知识体系是文明传承的核心载体。文字承载的思想是文明实践活动的概念化与理论化结晶。从古代典籍对中华文明的记录，到近代西方科学理论对世界格局的塑造，文字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始终是文明影响力的根本标志。所有现存的硬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或被取代，但反映一个时代实践的知识体系会留存下来，并且生生不息。

中国近代以来的巨大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诸多奇迹，都表明我们身处一个创造了伟大文明实践的时代。正因如此，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自主知识体系也日渐必要和紧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可谓正当其时。

思想方法论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近代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并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在此过程中，西方知识体系被视为标准甚至真理，非西方国家构建社会科学时往往被迫接受西方思想与方法，导致思想被殖民的现象在非西方国家盛行。

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自主知识体系，虽然离不开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但首先需明确概念理论与方法论的区别。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多源自自然科学，具有普遍性，但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是其学者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观察和理解西方实践经验的产物。由于西方各国历史发展轨迹、发展阶段不同，社会科学家视角各异，因而呈现出不同形态的社会科学。实际上，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西方社会科学。

其次，即使学习西方的方法论，也不能照抄照搬。尽管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受自然科学影响，但“社会科学”中，先“社会”后“科学”，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即便社会科学具有“统一性”，但“统一性”这一层并不厚实，甚至单薄。一言以蔽之，近代以来，所有可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是实践先于概念和理论，并且是可检验的。这和近代之前的形而上的思想不同，尤其是和宗教神学不同。形而上的思想不可验证，属于信仰范畴，但社会科学知识是形而下的，是可以验证的。

批判性应用西方方法论的三个层面。应用西方方法论必须具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至少需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作为工具的方法论。当前，许多学者虽从事经验性实证研究，但方法论工具存在诸多问题。随着学术训练的深入，学者们“工具箱”中的工具日益丰富，从大数据分析到微观案例研究等。这些强调逻辑和推理的工具方法具有普遍性，学者也希望通过使用它们掌握普遍真理。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很多人用复杂的“科学方法”论证显而易见的常识，研究缺乏明确的问题导向与重要性阐述，大量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数据和案例的堆砌中。更有甚者，为使用工具而寻找问题。一些“官僚式”的评审制度只关注材料与工具的匹配程度，更易导致研究者们“削足适履”，牺牲材料以适应特定的工具方法论。

第二，作为思维的方法论。如果仅从材料和工具层面寻找问题，那肯定会失败。找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拥有高层次的思想方法论，即思维方式或思想方式。现代大学有大量被称之为方法论的教科书，但是应用这些方法论却很难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更难转化成人所说的软力量。“阶级论”、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和韦伯的“科层论”。许多人善于使用这些理论来提出和分析问题，但却忽略了仅仅使用这些工具化的方法论是不能导向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更无从谈思想了。在学习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时，学者们最应当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发现了“阶级”及如何发现？为什么涂尔干发现了“社会分工”及如何发现？为什么韦伯发现了“科层”及如何发现？因为“阶级”“社会分工”“科层”都是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如果人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不但能够从更深层理解这些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更可能学会如何从思想层面思考问题，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应用者。

第三，作为思维的文化动力的方法论。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即使思维到了思想这个层面也是不够的。东西方的差异不在具体的工具或思想方法层面，而在于更深层次的文明和文化因素层面。由于思维底层的逻辑不同，东西方表现出本质性的差异。西

从方法论视角看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 郑永年

方社会科学思维中的两分法表现在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在西方的思维广谱中，很多概念之间都构成对立面。这不仅影响到西方学者对自身所处社会的看法，更影响到对非西方社会的看法。

中国的文明底蕴中就没有这样极端的两分法。尽管中国文明有“阴”“阳”之分，但二者并非绝对分离，而是相互嵌入，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再如，中国也有“文明”与“野蛮”之分，但两者是可变的。任何人通过教育都可以从“野蛮”转向“文明”。孔子也因此提倡“有教无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路径。意识到西方社会科学建构中的这三层方法论，我们就不难看出，在思维文化动力层面，西方国家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实践方面的差异，每个西方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普世”的西方理论。对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不加分析套用西方理论，不仅解释不了中国的实践经验，更会导致必然的失败。

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固然可以批判性应用，但中国社会科学只能基于中国实践之上，其主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命题和中国方案。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确立实践者的思想在社会科学中的主体和中心地位。这里的实践者尤其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先行者和领导者。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表明，实践者居于一线，他们首先遇到问题，发现问题，也首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受到过传统或者西方思想的影响，也会在实践中加以修正。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但实践者提供的是思想和洞见，只有经过学理化、系统化和实证化的转化，才能成为社会科学理论。

其次，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在不同的时空中产生和发展。因此，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必须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将中国放在自己的历史地图上，所构建的知识体系才具有“中国性”；把中国放到世界地图上，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才具有“世界性”。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排除历史，也不排斥西方。

构建具有“中国性”和“世界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件大事，马虎不得。它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基于中华文明智慧与中国实践经验的创造性重构，需要在思想的指导下找到正确的方法论，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解释实践，最终获得基于实践又能够指导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中国智慧。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理论 味